

杨铭著

吐蕃统治 敦煌西域研究

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

杨 铭 著

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金大山

2014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 / 杨铭著. —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4
(欧亚备要)
ISBN 978 - 7 - 100 - 10463 - 0

I. ①吐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吐蕃—民族历史—研究
IV. ①K2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0337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

杨 铭 著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
ISBN 978 - 7 - 100 - 10463 - 0

2014年12月第1版 开本 710×1000 1/16

201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1

定价：85.00元

编者的话

“欧亚备要”丛书所谓“欧亚”指内陆欧亚（Central Eurasia）。这是一个地理范畴，大致包括东北亚、北亚、中亚和东中欧。这一广袤地区的中央是一片大草原。在古代，由于游牧部族的活动，内陆欧亚各部（包括其周边）无论在政治、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有了密切的联系。因此，内陆欧亚常常被研究者视作一个整体。

尽管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已有关于内陆欧亚的丰富记载，但我国对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长期落后于国际学界。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始急起直追，严格说来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。当时筚路蓝缕的情景，不少人记忆犹新。

由于内陆欧亚研究难度大，早期的研究者要克服的障碍往往多于其他学科。这也体现在成果的发表方面：即使付梓，印数既少，错讹又多，再版希望渺茫，不少论著终于绝版。

有鉴于此，商务印书馆发大心愿，选择若干较优秀、尤急需者，请作者修订重印。不言而喻，这些原来分属各传统领域的著作（专著、资料、译作等）在“欧亚”的名义下汇聚在一起，有利于读者和研究者视野的开拓，其意义显然超越了单纯的再版。

应该指出的是，由于出版时期、出版单位不同，尤其是研究对象的不同，导致诸书体例上的差异，这次重新出版仅就若干大的方面做了调整，其余保持原状，无意划一，借此或可略窥本学科之发展轨迹也。

愿本丛书日积月累，为推动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起一点作用。

余太山

饶序 服罪斯更。凌乱之外，毁誉参杂，或称《于阗教法史》充塞，吾
所采于吐蕃事，皆杀之并多喜，盖各踵袭而进，实重译用自录。良苦耐
心。况其时吐蕃之乱，中朝尚用一念相度，言之恐疑，顾流而不安。

懿宗

即古辛 7001

近廿年来，中外藏学有极大之进展。法京辑刊《伯希和藏文文书选集》两辑（1978、1979），王尧先生印行吐蕃金石、简牍二录（1982、1984），其藏史要籍译本，陆续问世，而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先后绣梓，嘉惠来学，就中 P.T.1288 号《大事纪年》提供重要资料，尤为治史者所重视，钻研发蕴，大有其人。

龙朔中，吐蕃之叛，起于钦陵与吐谷浑不睦，递相表奏，各论曲直，朝廷未为与夺，激起怨怒，吐蕃以兵四十万败薛仁贵于青海大非川^①，遂灭吐谷浑，其余众徙灵州内附，为置安乐州，吐蕃由是壮大。^②继之，有四镇之争夺，唐室疲于应付，征伐累年。吐谷浑，藏人呼为阿赞者也。于阗为四镇之一，吐蕃称之为 li-yul，于其地设萨毗军帐，藏文资料若敦煌卷 P.T.960 号即《于阗教法史》残卷，暨《于阗国授记》，西方学者咸究心焉，而论著滋富。

吐蕃崛起，实肇于贞观十二年（638）入寇松州之役，杨铭先生以蜀人而留心藏事，频年纂辑，绩学忘疲。既致力于《大事纪年》，尚论吐蕃与突厥之关系，取婼羌古戍堡简册，钩索地名，穷其原委。复与周伟洲先生合

^① 《大事纪年》载马年（高宗咸亨元年）赞普于 o dang，及 ji me khol 大破唐师，I. Beckwith 谓其地即大非川。

^② 参见苏晋仁、萧鍊子：《〈册府元龟〉吐蕃史料校证》“龙朔三年”条，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1 年版，第 34—35 页。

作，研究《吐谷浑纪年》残卷，解谬辨疑，抉发尤多。可谓覃思精通，妙达神旨者矣。余自识君重庆，屡荷嘉贶名篇，喜是书之杀青，信有裨于来者，爰不辞荒陋，聊缀数言，勉副盛心，用当喤引，冀为读君书之一助耳。

饶宗颐

1997 年清明

自序

7世纪初，青藏高原上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政权——吐蕃。唐贞观初年，吐蕃著名的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邻近的苏毗、羊同后，定都逻些（今拉萨），创建官制，厘定法律，使吐蕃很快强盛起来。贞观八年（634），吐蕃“始遣使者来朝”，随即向唐朝请婚；贞观十五年，唐太宗以宗室女文成公主下嫁，松赞干布亲赴河源相迎，由此奠定了吐蕃与唐朝关系的基础，揭开了一千多年来汉、藏关系的序幕。

7世纪中叶始，以噶氏家族为代表的贵族集团总揽了吐蕃朝政，他们对内强化军政机构，对外进行武力扩张。7世纪70年代前后，吐蕃征服了驻牧于今青海、甘肃、四川西北一带的吐谷浑、党项、白兰等族，占据了今青海省境内黄河以南、青海湖以西等地区。与此同时，吐蕃又进军西域，联合西突厥贵族与唐朝争夺安西四镇，并开始染指今南疆的鄯善。唐中宗景龙四年（710），金城公主下嫁吐蕃，双方关系出现稳定、和好的局面，但不久又再起战端。由于唐朝当时处于强盛时期，又采取了积极防御、伺机进攻的战略，因此，在8世纪上半叶，吐蕃对唐朝陇右、河西的进攻没有显著的进展，双方战争主要集中在今青海东北的黄河一带。

唐玄宗天宝十四载（755），“安史之乱”爆发后，唐朝从河陇各地抽调了大批驻军，吐蕃军队乘虚而入，到广德元年（763）前后占领唐陇右诸州，到贞元七年（791），又攻占了唐河西数州之地及四镇之一的于阗。其中，沙州敦煌县于贞元二年（786）陷蕃。若从8世纪中叶吐蕃进据陇右算起，到

唐宣宗大中二年（848）张议潮起事，推翻吐蕃在敦煌及河陇的统治时止，吐蕃统治这一地区近百年之久。

陇右、河西，初唐时归陇右道管辖，至唐睿宗景云二年（711），因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，从陇右道分出黄河以西为河西道。分治后的两道，前者领秦、原、河、渭、兰、鄯、阶、成、洮、岷、临、廓、叠、宕十四州，后者领凉、甘、肃、瓜、沙、伊、西七州。又，唐朝曾于上元二年（675）于鄯善设石城镇，隶沙州；同年，唐朝在于阗设毗沙都督府，隶安西大都护府。吐蕃攻占这一广大地区后，是如何进行统治的呢？这个问题不论是从民族关系史，还是从隋唐史的研究来看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。但吐蕃统治时期，河陇、西域与内地的联系大为削弱，汉文史籍对此记载不详，敦煌等地发现的汉、藏文书虽然弥足珍贵，但残缺不全，为探讨这一问题带来了不少困难。时至今日，中外一些学者结合汉文史籍与敦煌汉、藏文书，对吐蕃统治河陇、西域的问题虽作过一些研究，弄清楚了一些历史事实，但对某些重大的问题仍缺乏深入的研究，譬如吐蕃在河陇地区设置了什么样的军政机构，吐蕃时期敦煌的部落及土地制度如何，吐蕃是怎样统治鄯善、于阗的，吐蕃与吐谷浑、突厥、回鹘的关系如何等问题，均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。

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着力在吐蕃史与敦煌史、西北民族史的相关领域上下功夫，利用敦煌古藏文文书不断影印出版、国内外藏学界研究成果不断问世的有利条件，对吐蕃统治河陇及西域这一重要历史阶段，展开了研究。其中，吐蕃对敦煌的统治无疑占有显著的位置，这主要是由于在敦煌保存了那段时期的一批文书，人们能够借以弄清楚当时的历史真相。相对而言，敦煌以外的地区，除了于阗和鄯善，保留下来的那一时期的文物或文书中与之有关的部分很少。所以说，要研究吐蕃统治河陇、西域的历史，敦煌的历史和文书均是第一位的，不从这里入手，不在这里掌握一把开启大门的钥匙，一切都无从谈起。因此，本书名为《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》。

目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卷首语 周祖庚文文魏古劍西 / 鐘鐸 | 藏不 |
| 上编 吐蕃对敦煌、西域的统治 | |
| 吐蕃时期河陇军政机构的设置 | 3 |
| 吐蕃时期敦煌的部落及土地制度 | 19 |
| 吐蕃统治下的汉、胡诸族 | 33 |
| 吐蕃统治下的鄯善 | 53 |
| 吐蕃统治下的于阗 | 69 |
| 中编 敦煌、西域古藏文文书研究 | |
| 一件有关敦煌陷蕃时间的藏文文书 | 85 |
| P.T.1089《吐蕃官吏呈请状》研究 | 95 |
| 关于《吐谷浑（阿柴）纪年》残卷的研究 | 114 |
| 《大事纪年》所载吐蕃与突厥关系考 | 132 |
| 敦煌藏文卷子中的“蛮貊”研究 | 145 |
| 有关于阗王的藏文写卷研究 | 158 |
| 吐蕃简牍中所见的西域地名 | 168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卷首语 周祖庚文文魏古劍西 / 鐘鐸 | 藏不 |
| 上编 吐蕃对敦煌、西域的统治 | |
| 吐蕃时期河陇军政机构的设置 | 3 |
| 吐蕃时期敦煌的部落及土地制度 | 19 |
| 吐蕃统治下的汉、胡诸族 | 33 |
| 吐蕃统治下的鄯善 | 53 |
| 吐蕃统治下的于阗 | 69 |
| 中编 敦煌、西域古藏文文书研究 | |
| 一件有关敦煌陷蕃时间的藏文文书 | 85 |
| P.T.1089《吐蕃官吏呈请状》研究 | 95 |
| 关于《吐谷浑（阿柴）纪年》残卷的研究 | 114 |
| 《大事纪年》所载吐蕃与突厥关系考 | 132 |
| 敦煌藏文卷子中的“蛮貊”研究 | 145 |
| 有关于阗王的藏文写卷研究 | 158 |
| 吐蕃简牍中所见的西域地名 | 168 |

“敦煌学”与“西域学”“藏学”等学术研究的结合，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大趋势。在这一大趋势下，“敦煌学”与“西域学”“藏学”等学术研究的结合，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大趋势。

然而，由于学者们对这些学科的研究还不够深入，因此，在这一大趋势下，“敦煌学”与“西域学”“藏学”等学术研究的结合，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大趋势。

下编 敦煌、西域古藏文文书所见名号考

- 东叶护可汗 (ton ya bgo kha gan) 考 183
- 吐蕃十将 (tshan bcu) 制考述 189
- 曹 (tshar)：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 201
- 藏文文献关于萨毗 (tshal byi) 的记载 210
- 敦煌文书中的 tho bal 与南波 218
- 通颊 (mthong khyab) 考 226
- 粟特 (sog dag) 考 233

附录

- 吐蕃与南亚、中亚各国关系史述略 241
- 征引与参考文献 277
- 藏、汉译名对照 302
- 作者主要论著 316

后记 322

再版后记 324

提要述序文

序言 307

第一章 宋耶若突厥的二属子关押

上编 吐蕃对敦煌、西域的统治

上 编

吐蕃对敦煌、西域的统治

在敦煌学研究中，要弄清吐蕃对敦煌的统治，就必须弄清楚吐蕃对敦煌的占领时间。关于吐蕃对敦煌的占领时间，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意见：一种意见认为是7世纪末至8世纪初，即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初，吐蕃占领了敦煌；另一种意见认为是7世纪末至8世纪中期，即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中期，吐蕃占领了敦煌；第三种意见认为是7世纪末至8世纪末，即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末，吐蕃占领了敦煌。

首先，从考古学的角度看，7世纪末至8世纪初，敦煌地区的居民开始使用吐蕃文字，这说明吐蕃对敦煌的统治已经开始。其次，从吐蕃对敦煌的统治时间来看，吐蕃对敦煌的统治时间大约在7世纪末至8世纪中期，即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中期，吐蕃占领了敦煌。再次，从吐蕃对敦煌的统治时间来看，吐蕃对敦煌的统治时间大约在7世纪末至8世纪末，即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末，吐蕃占领了敦煌。

上 编 吐蕃对敦煌、西域的统治

在敦煌学研究中，要弄清吐蕃对敦煌的统治，就必须弄清楚吐蕃对敦煌的占领时间。关于吐蕃对敦煌的占领时间，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意见：

一种意见认为是7世纪末至8世纪初，即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初，吐蕃占领了敦煌；另一种意见认为是7世纪末至8世纪中期，即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中期，吐蕃占领了敦煌；第三种意见认为是7世纪末至8世纪末，即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末，吐蕃占领了敦煌。

吐蕃时期河陇军政机构的设置

7世纪初，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强盛起来，迅速向东北方向发展，不断进攻唐朝河陇地区。由于唐朝当时处于强盛时期，又采取了积极防御、伺机进攻的战略，所以，直到8世纪上半叶，吐蕃对河陇的进攻没有显著的进展，双方战争主要集中在今青海东北的黄河一带。

唐玄宗天宝十四载（755），“安史之乱”爆发后，唐朝从河陇各地抽调了大批驻军。吐蕃军队乘虚而入，到广德元年（763）前后占领唐陇右诸州，到贞元七年（791）又攻占了唐河西数州之地。从此，河陇地区相继为吐蕃所统治。吐蕃攻占这一广大地区后，是如何进行统治的呢？以下就吐蕃统治河陇的军政机构，即诸节度使的设置等问题展开讨论。

一、吐蕃河陇五节度的由来

结合汉、藏文史料来看，吐蕃于河陇地区主要采取了军政合一的所谓“节度使”制。

汉文史料不止一处记载，吐蕃在河陇设有节度使一职。《新唐书·韦皋传》载，贞元十七年（801），唐军攻维州，“吐蕃释灵朔（今宁夏灵武一带）

兵，使论莽热以内大相兼东境五节度大使，率杂虏十万来救”^①，就是一例。“五节度”之外，又有“四节度”说。大历九年（774），郭子仪上书曰：“今吐蕃兼吞河、陇，杂羌、浑之众，岁深入畿郊，势逾十倍，与之角胜，岂易得邪？属者虏来，称四节度，将别万人，人兼数马。”^②《通鉴考异》卷一七引《汾阳家传》亦称，大历八年十月，“吐蕃四节度历泾川（泾河），过阁川（纳河）南，于渭河合军，公遣浑瑊等前后相接以待之”。可知确有吐蕃“四节度”之说。

吐蕃乘唐朝内乱，至广德元年已先攻占陇右诸州，后又相继攻占凉州（764）、甘州（766）、肃州（766）、瓜州（776）和沙州（786）。“四节度”之说最早见于大历八年左右，即是说大历十一年吐蕃攻占瓜州以前，吐蕃已于河陇占领区设置“四节度”，^③攻占瓜、沙之后，又于瓜州新置一节度使。为了统一在河陇的军事行动，吐蕃将瓜州节度使划归东境节度大使统率，^④故有前引“东境五节度”之称。

敦煌汉文卷子中，也有关于吐蕃节度使的记载，如P.2991《莫高窟素画功德赞文》有“瓜沙境大行军都节度衙”，P.2449《祈福文》有“瓜州新节度使”，S.542《沙州诸寺丁仕车牛役簿》有“瓜州节度”等。^⑤20世纪50年

^① 《旧唐书》卷一四〇《韦皋传》、卷一九六《吐蕃传》，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三六“贞元十八年正月”条所记略同。《新唐书》卷二一六《吐蕃传》则曰：“论莽热没笼乞悉菴兼松州五道节度兵马都统、群牧大使，引兵十万援维州。”“论莽热没笼乞悉菴”似为“大论·论莽热”之异写。唐代藏文声母 b 可对应切韵之明母 m，“没笼乞悉菴”恐即“大论”（blon ched po）的译音，故两书所载，系为一人。“兼松州”详后。藏文与切韵声母对应，参见罗常培：《唐五代西北方音》附表一，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。

^② 《新唐书》卷一三七《郭子仪传》。

^③ 胡三省于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四七“会昌四年三月”条“朝廷以回鹘衰微，吐蕃内乱，议复河、湟四镇十八州”下注：“开元之盛，陇右、河西分为两镇而已。盖沦陷之后，吐蕃分为四镇也。”此言似取吐蕃“四节度”说。按《全唐文》卷六九九李德裕《赐缘边诸镇密诏意》曰：“国家陇右、河西四镇一十八州，皆是吐蕃因中国有难，相继陷没。”则唐人所言河陇四镇应即唐朝陇右、河西、安西、北庭四节度使，非指吐蕃于河陇所置四节度，胡注误。

^④ P.2555《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》、P.3395《宰相尚腊藏嘘律钵礼佛文》、P.T.1083《据唐人部落禀帖批复的告牒》等文书，提到吐蕃“东道节度”、“东军相令公”等对沙州、肃州的统治或影响，详后。

^⑤ 转引自藤枝晃：《敦煌千佛洞の中兴》，《东方学报》第35册（1964），第43页；戴密微著、耿昇译：《吐蕃僧诤记》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328页；池田温：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，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版，第523页。

代初，法国学者戴密微著《吐蕃僧诤记》一书，提出敦煌汉文卷子中的“节度使”可能是藏文 *ston dpon*（千户长）一词的对译。^①之后，日本学者藤枝晃认为“节度使”是《蕃汉对译语汇》中 *khri dpon*（万户长）的意译。^②匈牙利藏学家乌瑞则提出，敦煌汉文卷子中的“节度使”，应相当于藏文卷子中的 *dmag dpon*（将军），而“节度使”统领的军政机构就是藏文卷子中的 *khrom*（节度衙），这是 7 至 9 世纪吐蕃设于本土之外的一级军政机构，它管辖的范围相当于唐朝的几个州。^③

P.T.1088 写本就有吐蕃瓜州节度衙的记载，曰：“兔年春，瓜州节度衙（*kwa cu khrom*）会议在肃州举行。”^④ P.T.1089 卷子记载，吐蕃统治中期，沙州节儿以下汉人官吏等对序列与位阶不满，常起争执，经“瓜州将军”（*kwa cu dmag pon*）与都护等商议决定，颁布新的序列与位阶。^⑤这些记载与汉文卷子中吐蕃瓜州“节度衙”、“节度使”的记载是相符合的。

吐蕃节度衙的出现是很早的，P.T.1288《大事纪年》记 676 年“董布躬身亲往青海节度衙（*khri bshos khrom*）”，^⑥是目前看到的最早的记载。今青海湖以南以西地区，唐初是吐谷浑、白兰等族的居地。7 世纪中叶以后，吐蕃征服了这些民族，这一带为吐蕃占有。当时，吐蕃实行“五翼六十一东岱

① 戴密微著、耿昇译：《吐蕃僧诤记》，第 329 页。

② 藤枝晃：《吐蕃支配期の敦煌》，《东方学报》第 31 册（1961），第 220—221 页。

③ G. Uray, “KHROM: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ibetan Empire in the 7th-9th Centuries”, *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*, Aris and Phillips, 1979, p.312. 国内外藏学家对 *khrom* 一词曾有不同的认识。*khrom*，今意为“市场”。英国学者 F. W. 托马斯在 1951 年出版的 *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* 第 2 卷中，仍将 *khrom* 释为“市”；日本学者山口瑞凤译为“军团”；国内王尧等译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时，曾把 *khrom* 释为地名，后从乌瑞说，认为 *khrom* 是一级军政机构，译作“行军衙”。此处“节度衙”的译法，是参照 P.2991 中的“瓜沙境大行军都节度衙”而来的。

④ M. Lalou, *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-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*, II, Paris, 1950, p.57.

⑤ 山口瑞凤：《沙州汉人による吐蕃二军团の成立と *mkhar tsan* 军团の位置》，《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施設研究紀要》第 4 号（1980），第 18 页。

⑥ G. Uray, “KHROM: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ibetan Empire in the 7th-9th Centuries”, *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*, p.313. 参见王尧、陈践：《吐蕃兵制考略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1986 年第 1 期。

(千户)”的军事制度。^①在吐蕃向外进行武力征服的过程中，这些千户被派往各地作战，因此当来自各个翼的千户进驻青海湖附近地区后，就必须设置一个新的军政机构来统一指挥，吐蕃青海节度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。之后，在攻占唐朝河陇及其他地区的过程中，吐蕃相继于新的占领区设置节度使，用以统辖进入该地区的各千户的行动，以及对被征服民族进行管理，这就出现了前面论及的诸节度使。《册府元龟·外臣部》曰：“(吐蕃)自其王弃宗弄赞，唐太宗贞观后吞并诸蕃，地方千里，每十节度置一上相统之。”这里反映的就是吐蕃设节度使统辖新征服地区的情况。

吐蕃节度使这种军政官制，与唐朝在沿边地区设置的节度使制有相似之处。唐朝本有节度使一职，天宝年间，沿边有九节度使、一经略使，职权为管理当地军事、民政事务。^②吐蕃在占领区设置 khrom 这种机构，其将军所领也是数州军民事务，故留居河陇及中原方面的唐人仍以“节度衙”、“节度使”相称，这就是汉文史料中有吐蕃节度使一类记载的原因。

二、河陇五节度使及其作用

根据汉、藏文史料，吐蕃于河陇地区设置的五节度使，是青海节度使、鄯州节度使、河州节度使、凉州节度使和瓜州节度使，现分述如下。

(一) 青海节度使

青海节度使是吐蕃河陇诸节度中最先出现的，《大事纪年》记 676 年吐蕃大臣董布等前往“青海节度衙”。《新唐书·吐蕃传》记仪凤初吐蕃曾进攻鄯、廓、河、芳诸州，吐蕃大臣董布前往青海节度衙，或与这次进攻有关。

^① 参见巴俄·祖拉陈瓦：《智者喜宴》，民族出版社 1986 年藏文本，第 185—188 页；山口瑞凤：《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》，岩波书店 1983 年版，第 912—914 页。五翼为：中翼（伍茹）、右翼（叶茹）、左翼（约茹）、支部翼（茹拉）、第三翼（孙波茹）。

^② 参见《唐会要》卷七八《节度使》；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五“天宝元年正月”条。

又，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五“天宝元年（742）十二月”条曰：“戊戌，又奏破青海道莽布支营三万余众，斩获五千余级。”《旧唐书·韦皋传》有“（吐蕃）东道五节度”的记载，因而，所谓“青海道”，应指吐蕃青海节度衙。安史之乱以后，吐蕃攻占河陇，吐蕃青海节度使成为东境五节度之一。贞元五年（789），吐蕃青海节度使曾率兵南下，在唐朝剑南道嘉州附近，配合吐蕃南线的腊城节度使与唐军作战。^①会昌二年（842），吐蕃洛门川讨击使尚恐热与“青海节度使同盟举兵”，反对新立的赞普乞离胡。^②从当时吐蕃另有鄯州节度使来看，青海节度使的驻地似在青海湖东南一带。^③

（二）鄯州节度使

《新唐书·吐蕃传》记会昌三年（843）吐蕃洛门川讨击使尚恐热率兵万骑“击鄯州节度使尚婢婢”。鄯州，治今青海乐都，为唐朝陇右节度使治所，吐蕃设鄯州节度使似亦在此。

吐蕃鄯州节度使，可能设置于吐蕃攻占唐朝鄯州（757）之后，拉萨《达札路恭纪功碑》记达札路恭功绩说：“于唐境之野猫川……湟水之滨……等地……开始纳贡。”^④“野猫川”（khyar mo thang），又译“雅莫塘”，托马斯认为在青海湖东面。^⑤联系此方位及《达札路恭纪功碑》所涉事件的年代（755—763），可认为“唐境之野猫川”就在鄯州地方。P.T.16《吐蕃官吏礼佛文》中有“雅莫塘节度衙”^⑥，应即为吐蕃鄯州节度使所领。

① 《旧唐书》卷一四〇《韦皋传》。

②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四六“会昌二年十二月”条。

③ 王忠认为吐蕃青海节度使似即东道节度使，驻跸河州。参见王忠：《新唐书吐蕃传笺证》，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，第151页。但吐蕃另有河州节度使一职，故不从，详后。

④ 王尧编著：《吐蕃金石录》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84页。

⑤ F. W. Thomas, *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*, II, London, 1951, p.106.

⑥ A. Macdonald et Yoshirō Imaeda, *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omplété par Quelques Manuscrits de l'India Office et du British Museum*, I, Paris, 1978, pp.12-13; G. Uray, “KHROM: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ibetan Empire in the 7th-9th Centuries”, *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*, p.313.